

儒家
RUJIA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胡锐军◎著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

——以政治秩序为分析框架




吉林
大学
出版
社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 ——以政治秩序为分析框架

胡锐军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 / 胡锐军著. — 长春：吉林
大学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601-8249-0

I. ①儒… II. ①胡… III. ①儒家 - 政治思想 - 研
究 IV. ①D092.2②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57588号

书 名：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研究
作 者：胡锐军 著

责任编辑：朱进 责任校对：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9.5 字数：320千字
ISBN 978-7-5601-8249-0

封面设计：美印图文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12年11月 第1版
2012年11月 第1次印刷
定价：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501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作者简介

ZUOZHEJIANJIE

胡锐军，男，江西高安人，1975年8月生，吉林大学政治学理论博士毕业，现为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社会科学教研部副教授，中共中央编译局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传统政治文化、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研究。于2008年9月—12月在英国伦敦南岸大学访学，2010年9月—2011年9月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孔子研究》、《探索》、《晋阳学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50余篇，参与和主持国家、省部级课题多项。

内容提要

NEIRONGTIYAO

从政治儒学的视角看，儒家思想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的政设计学说。历代的儒者们都在努力尝试并构思一种精巧的政治设计，他们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为旨归，设计并建构了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的政治秩序样式，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理想归依，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儒家的这种政设计思想对维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它也因失去根系赖以蔓衍芜生的土壤而最终崩溃，此后的很长时间，历经的都是蹇剥的时运，社会和学界对其功过是非的评价也多种多样，论争也一直持续至当下。可见，究竟如何来审视和评价儒家政治文化仍有重要的价值，而且，时下，道德沦丧、精神迷失、政治腐败等社会政设计问题和时代积弊正不断滋生，和谐社会和民主政设计建设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破冰前行，重新省思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就更加必要和迫切。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本书以政设计秩序为分析框架，择取传统儒家政设计思想的共性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其现实层面的君主政设计秩序样式，对儒家政设计思想及其政设计秩序样式的基本体系、价值属性、理论特征、时代效用、历史影响、现代转向等内容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审视和考量。最终对儒家政设计思想诉求和没落的原因及如何进行现代转向等问题作了一新视角的尝试和探讨性的现代式回答。

目 录

绪 论	1
一、百年来儒学研究境况历史回眸与反思	3
(一) 历史回眸	3
(二) 境况反思	14
二、论文主旨和研究路径	19
(一) 论文主旨	19
(二) 研究路径	21
第一章 政治秩序涵义梳理及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宏观略览	23
第一节 政治秩序涵义分析和梳理	24
一、政治秩序的基本概念	24
二、政治秩序的构成要素	29
三、政治秩序的运行和评价	33
第二节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宏观略览与概观	36
一、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基本内容	36
二、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历史命运	39
第二章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双重驱力及其本体论论证	44
第一节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双重驱力：历史的实证分析	44
一、实存秩序性焦虑与担忧：政治因素	45
二、小农经济的催生和引领：经济因素	47

第二节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本体论论证：哲学的理论分析·····	51
一、天命命题：天命—天理—（天）道决定论·····	52
二、人性命题：性善论·····	62
三、阴阳命题：阳尊阴卑、阴阳互动论·····	69
第三章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维度及其合法性基础·····	78
第一节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维度·····	78
一、以大一统王权主义为目标：一统、王权·····	78
二、以道德为规范和治理方式：德治、礼治·····	81
三、以和谐和稳定为运行旨趣：和谐、稳定·····	84
四、以等级式制度为结构安排：等级、官僚·····	86
第二节 儒家政治秩序建构的合法性基础·····	89
一、君权神授：合法性的形上基础·····	91
二、血缘认同：合法性的宗法基础·····	94
三、古远传统：合法性的历史基础·····	95
四、精英崇拜：合法性的民意基础·····	99
第四章 儒家政治秩序的样式演变及其基本设计体系·····	102
第一节 儒家政治秩序的样式演变·····	102
一、原生形态：先秦样式·····	104
二、次生形态：两汉样式·····	104
三、再生形态：宋明样式·····	105
四、衍生形态：清代样式·····	106
第二节 儒家政治秩序的基本设计体系·····	110
一、实体层面：己—家—君（国）·····	112
二、规范层面：三纲五常·····	118
三、秩序力层面：仁政、家长式权威·····	134

第五章 儒家政治秩序的作用机理和运行矢量	142
第一节 儒家政治秩序的作用机理	143
一、三角互动	143
二、双向互动	145
第二节 儒家政治秩序运行的基础矢量	148
一、均平	148
二、德治	150
三、礼治	157
四、三纲	166
五、仁政	168
第三节 儒家政治秩序运行的调控矢量	172
一、权威：控制器	172
二、中庸：平衡器	176
三、民本：稳定器	181
第六章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现代审视和考量	186
第一节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秩序设计判断	187
一、现实基础判断	187
二、理论根源判断	190
三、合法性基础判断	197
四、秩序结构判断	202
五、秩序目标判断	213
第二节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秩序效果判断	223
一、关系判断	223
二、行为判断	226
三、外部性判断	232
四、过程判断	236
五、价值判断	240

第三节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审视与考量的结论性分析·····	252
一、综论性概析·····	252
二、总结性结论·····	259
第七章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现代转向·····	262
第一节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现代转向的政治学视野·····	262
一、传统价值的承接性和连续性·····	263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和发展性·····	265
三、现代政治秩序运行的需要性和吸纳性·····	267
第二节 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现代转向的路径和要素·····	270
一、转向的路径和原则·····	270
二、转向的要素和内容·····	276
结 语·····	283
参考文献·····	285
图表目录·····	298
后 记（一）·····	299
后 记（二）·····	302

绪 论

从政治儒学的视角看，儒家思想是一个以全面安排人间政治秩序为目标的
政治设计学说。历代的儒者们都一直在努力尝试并构思一种精巧的政治设计，
他们以探求理想政治秩序作为旨归，设计并建构了现实和理想两个层面的政治
秩序样式，把追求“王权主义→小康社会→大同世界”作为自己的理想归依，
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体系。儒家的这种政治设计思想及其实践理念始终在中
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自孔子首创以来，儒学绵延千
里，潮起潮落，在封建社会几千年的历史时序里，历经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和流
变历程，其设计的政治秩序模式也最终迷失和没落。

作为一种完整的价值形态，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对维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
君主专制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自汉以降取得官学地位以来，这种作用
尤为彰显，并表现为积极与消极、时效与缺陷、理想与困境的两面效用。一方
面，它催生和引领了许多火热的政治实践，把诸如以德治国、以礼安邦、贵和
尚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至善至仁、乐群笃行、明义重公等人文精神深深
地注入了中华民族治国理政的致思取向和行为活动中，锻造了中华民族坚韧务
实、忠诚为国的民族和政治性格，显兆了中华民族的脊梁；另一方面，它又充
当着封建卫道士的角色，在现实生活中，无法提供和营造自由、平等、民主、
正义、福利、尊严、法治等基本政治价值和宽松政治氛围，无法满足和实现人
民获得民主权利、主人翁地位、幸福生活等主体价值需求和殷切希冀，相反，
过重的伦理倚重却对中华民族的兴盛形成了一定的阻滞。

正是这种两面性的双重作用，决定了儒学曲折的历史演进历程和沧桑的历
史命运，有过官学的荣耀、也有过被贬逆的悲凉，几次遭到各方势力的反对、
围攻，几次险被清除出局。就其本身的理论发展形态而言，儒学历经了一个萌
芽、形成、勃兴、式微、颓势、没落的发展和流变过程，由于学而神学、经
学、理学、心学、实学、朴学，到最后彻底溃落，形态屡经变换。纵然，这反
映了其内部自我批评与更新的过程，但也无疑昭示了其颠簸起伏的历史命运，
尤其在价值重建的五四和政治过热的“文革”时期，失去了官学地位的儒学其

境遇更加地悲鸣。

与近代儒学的历史境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取得了较好的传播和发展态势，它的学术坐标几乎完全置换了传统文化的位置，它在给我们带来思想智慧和灵光的同时，也以其本身自有的缺陷性一面对我们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出现了许多令人担忧的状况。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因种种原因而导致的问题也越来越突出。这些因素导致的问题使我们面临着巨大的考验，物欲至上、个人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等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开始抬头，有很多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包括：发展问题、政治文明问题、文化问题、公共性问题、社会转型问题、“三农”问题、下岗工人就业问题、军人转业问题、教育问题、创新问题、生态问题、生存问题、价值观问题、道德颓废问题、底线失守问题、人的问题、交往问题、宗教问题、突发事件应急问题、国家安全问题、恐怖主义问题、祖国统一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使我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吧思路重新拉回到传统政治文化上来，促使我们重新用现代的眼光来审视和考量我们的传统，尤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学传统。

儒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我们所历经及正在历经的一系列现实告诉我们，对一种曾经在本民族历史征程上起过重要作用的政治理论形态进行全盘否定是不可取的，其曲折的发展历程和它在各个时期的使命就向我们证明，一个能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变迁中世代相传、绵延不绝的理论体系，其思想必然有着合乎和超越时代的特质，具有着恒常的价值因子和普遍意义，有着它的生命力所在。作为一种入世的政治设计思想，它自然会有而且也肯定会有感应时代的内容，有一套与当时客观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相适应，用以落实和指导社会政治生活的操作规范和治理模式。现实的发展证明，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和历史阶段，都不能完全抛弃本民族的传统，什么时候继承它，什么时候就发展，反之，则是问题凸显和矛盾丛生，这里并非认为传统政治文化可以绝对充当现代文明的助产士和疗救时弊的医生，但是运用它的力量，却是必须和必要的。

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需要儒学而是如何来真正分析、看待和评价儒学，如何找寻出儒家政治设计思想起落沉浮的缘由与困境，如何在当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重新反思和考量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在治理国家中的积极价值，把有益的东西接续下来并实现其现代的转向与重构。然而，在近代以来近百年的儒学学术史演进中，无论是大陆学者还是港

台的新儒家或是其他中道的学术人物，都没有对上述问题给出满意的回答，真正开出政治儒学重构和转向的路途。显然，重新开辟儒学政治文化层面研究的新视野和视角，从更深层次、更新视角去挖掘儒家政治设计思想何以长存而又最终没落的缘由，进而探讨性地开创其现代转向的路途，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符合时宜。

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思考，本书拟以政治秩序为分析框架，择取传统儒家政治设计思想的共性为研究对象，立足于其现实层面的君主政治秩序样式，对儒家政治设计思想及其政治秩序样式的基本体系、价值属性、理论特征、时代效用、历史影响、现代转向等内容进行全面的研究、审视和考量。最终对儒家政治设计思想诉求和没落的原因及如何对其进行现代转向等问题作出一新视角的尝试和探讨性的现代式回答。

一、百年来儒学研究境况历史回眸与反思

（一）历史回眸

在从近代以来到现在的百余年间，是儒学遭遇空前危机和严峻挑战，面临诸多诘难，也享有部分重建机遇的百年。几乎整个20世纪的历程都是作为整体的儒家文化历经解体、离散、飘零和重构的历史，儒学既斯文扫地、困厄沉沦又隐逸地栖息在民间和部分学者的心里，成为中国众多思想家、学者和学术群体批判和反思的对象。百年间，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学术界，从中学与西学、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激进、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儒学与新学、儒学与世界文化、民族化与全球化、文明冲突与文明对话等诸多论争性问题的角度，围绕着孔子、儒家、儒学的历史价值评估及其现代命运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广泛和持久的探讨，各种学派、思潮、主义纷纷粉墨登场、交相辉映，论辩性地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了少有的复杂性、丰富性、多样性和严肃性，构成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这百余年的儒学学术史几乎浓缩了整个儒家盛衰更迭、荣辱交替的历史。这百年间，儒学的自身演进及学界对之的研究，简要归纳起来，大致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末至1911年辛亥革命。

这一期，对儒学进行全面反思和评估的代表人物当数康有为。在革命风暴席卷神州、社会聚变、封建统治摇摇欲坠、西学思潮泛起、儒学日益步入困境的历史境况下，康有为以其《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这三篇开篇之作，开启了近代儒学重构或重释的先河。他以大胆的怀疑和辨伪精神，开辟了儒学研究的新方向，开始了儒学自我改造的系统工程，促进了中

国近现代儒学由信古向疑古的转变。

自然，他的学术研究本身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怀有“托古改制”以图再续王政的目的，其中不免有许多穿凿附会、强辩武断之处，但就整个中国近代学术史及儒学研究的大势而论，康有为之举更多的还是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和振聋发聩的，他的思想如一股飓风，吹遍了当时中国的学术大地。在他的引领下，思想界的众多先觉之士、学辈名流，如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对儒学的批判、反思和重新诠释也开始初见端倪，他们以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为参照系，以“诸子学”为比较对象，对儒家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阐发。

第二阶段：1911年至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中国。

这一期间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狂飙突进的大时代，儒学乃至整个中国思想文化在这个历史时期历经了空前绝后的冲击和碰撞，是一个文化启蒙也是儒学经受灭顶之灾的年代。在这一时期，法国的人权说、英美自由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创造进化论、斯宾塞的政治哲学、孟德斯鸠的法哲学、边沁的功利主义、孔德的实证主义、杜威的实验主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及各种牌号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凡西方流行的“新”学说，几乎无不一一输入到中国¹。随着西方学术思潮的不断引介和涌入，中国思想界如受到一股强烈的刺激般开始兴奋起来，在不断的论争和探讨中，他们确认了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其他诸多不同派系、国界的文化价值体系，从而彻底推翻了儒学的官学和文化至尊地位，并把儒学视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视之为陈腐的代名词。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被提了出来，各种论争纷然交织，开启了20世纪重释儒学及中国学术文化百家争鸣的又一伟大时代。

这一期间，围绕着如何研究和评价儒学可谓学派林立，反儒者有之、护儒者有之、辩儒者有之，他们彼此论争、互动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百年来儒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在这当中，反孔、反儒者首推陈独秀。1916年，陈独秀在其创办的《青年杂志》²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在当时看来几乎是惊世骇俗的观点，即儒学不适合于中国的现代社会，亟需改弦易辙。此后，他扛起“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不断地提出反孔、反儒的言论，如他说：“宗法

1 宝成关：《西方文化与中国社会——西学东渐史论》，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500—503页。

2 从第2期起改名为《新青年》。

社会之奴隶道德，病在分别尊卑，课卑者以片面之义务，于是君疟臣，父疟子，姑疟媳，夫疟妻，主疟奴，长疟幼。社会上种种之不道德，种种罪恶，施之者以为当然之权利，受之者皆服从于奴隶道德下而莫之能违，弱者多衔怨以殁世，强者则激而倒行逆施矣。以此种道德支配今日之社会，维系今日之人心，欲其不浇漓堕落也，其扬汤止沸耳，岂但南辕北辙而已哉！”¹

鲁迅和吴虞也对儒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抨击，他们把儒学看成是“吃人”的礼教。鲁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地每一页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²吴虞说：“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甚么‘文节公’呀，‘忠烈公’呀，都是那些吃人的人的圈套，来诳骗我们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³

李大钊则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来评价孔子。他著名的观点是认为孔学与现代宪法不相容，在1917年《孔子与宪法》一文中他写道：“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也。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入于现代国民之血气精神所结晶之宪法，则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非我辈生人之宪法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宪法者现代国民之证券也。专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于宪法”⁴。

而胡适则以西方的哲学方法论为依据，从比照西方文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评价儒学，对中国儒学基本上持“否定”和“改造”的态度，认为需要以西方的哲学思辨方式和文化模式来评价并改造传统儒学乃至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此同时，护儒、辩儒者也大有人在，康有为、陈焕章、章太炎、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等均从不同的侧面对如何评价和重释儒学进行了阐释。

总之，“五四”期间，是各种思想和文化急风暴雨式变革和争鸣的时代，各种反儒、护儒、辩儒等思想和学派林立，论战诸多，简要举来有：康有为、陈焕章等创建的孔教会；梁启超、梁漱溟、杜亚泉、章太炎等为代表形成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派系；以梅光迪、吴宓等为代表的学衡派与《新青年》派展开

1 陈独秀：《陈独秀答傅桂馨语》，《新青年》第3卷第1号。

2 鲁迅：《狂人日记》，《新青年》第4卷第5号。

3 吴虞：《吃人与礼教》，《新青年》第6卷第6号。

4 李大钊：《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77页。

的思想文化论辩；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主义与张君勱、梁启超为代表的人文主义之间的科玄论争。这些争鸣和思想论战，大体都是围绕着如何评价儒学、反思儒学、重释儒学、重构儒学而展开的，形成了近代中国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三大思潮相互碰撞、冲突和互动的三驾并驱态势。质而言之，“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百余年儒学研究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大时代，它以激烈的批判形式，使儒学开始进一步地思索和反省自己，促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一次艰难转型和价值重建，推动着我们古老的中华民族昂然走向现代。

第三阶段：1928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

这一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全国上下民族救亡和复兴运动高涨，在这样的时势下，儒学研究获得了难得的契机和历史机缘。民族的危机感，使得许多有识之士认为，要复兴我们的民族、护卫我们的国家，首先就是要复兴我们的民族文化，而文化的复兴根本上来说就是儒学的复兴。他们认为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从本质上以儒家思想去对抗或儒化西洋文化，中国就肯定会失掉自己的文化主权沦为他国的文化殖民地。以此思路出发，儒学研究在这个阶段主要表现为接续宋明道学的传统，“援西学入儒学”，创造性地诠释、综合和会通儒学与西学，以使传统儒学向现代思想和学术形态转换。

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学派有：以熊十力、贺麟、牟宗三等为代表的新心学，主张对儒家礼教和纲常进行重新诠释，牟宗三1948年在《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还首次提出了儒学第三期发展说；以冯友兰为代表的新理学，主张对中体西用进行新的解释；与此同时，胡适1934年发表《说儒》阐释了其在儒家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精神关系方面的新看法；而梁漱溟在重庆创办了免仁书院、马一浮在杭州创办了复性书院、张君勱在大理创办了民族文化书院；此外，陶希圣、王新命、何炳松、张岱年等学者也对如何评价和重构儒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1935年1月10日陶希圣、王新命、何炳松等10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1935年3月18日张岱年发表《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他们都强调中国文化有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特色，认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建设和创新中国的本位文化。期间，费孝通还从社会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了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和影响，并于1948年在上海出版了著名的《乡土中国》一书。

第四阶段：1949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

这一时期，新中国成立，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由“五四”文化时期

引进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了指导思想，开始了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这样，儒学在大陆便悄然地退出了民国时代在封建买办专制主义那儿占有的一点点舞台，散落在民间，大陆对儒学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是，政治和阶级斗争的过热，使得本该在文化学术层面自由进行的儒学研究返回到了严肃的现实社会政治层面，儒学研究也因此受到了政治的干预而无所适从，儒学的中心价值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已不再公开露面，只能以各种各样的碎片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当中，像一片云雾栖息在少数人的心里，像古玩一样珍藏着，无论中国的知识分子对儒学抱着肯定或否定的态度，都已没有了多少参与的机会。正如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论》中所说的，儒学成为了陷于困境的“游魂”，他说：“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了，……儒学死亡之后已变成了一个‘游魂’了”¹，最终，丧失了建制功能和机会的儒学在文革时遭到了巨大诘难。

就这个阶段儒学研究的整个过程来看，出现了大陆和港台的二域分野，出于政治的需要和缘由，大陆对儒学的研究主要以批判为主，思想界、学术界普遍以“唯物”与“唯心”、“革命”与“反动”、“进步”与“保守”、“革新”与“复古”等标准或教条对从孔子到康有为的儒家代表人物进行划线和批判。除梁漱溟、熊十力继续由佛入儒固守着自己的研究之地等少数人外，原来被视为现代儒学的代表人物，像贺麟、冯友兰等都脱胎换骨进行思想改造，以致批判自己前期的新心学和新理学，即使他们研究孔子、儒学的文章，也都离不开批判性研究的圈囿。到70年代中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行和群众性的批孔批儒运动的高涨，连冯友兰也不得不迫于形势撰写批孔文章，儒学研究根本无学术性可言。可以说，大陆在服务于政治需要的氛围下进行的儒学研究，其水准是大打折扣的，这不仅是历史光阴的损失，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元气的损伤，令人不堪回首。

与大陆相反，儒学在港台地区与海外华人社区却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确认和接续，自50年代起，移居港台以及旅美的学者，如张君勱、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陈荣捷等，立足于教育界、学术界，有感于儒学的没落，继续以弘扬儒家精神为己任，试图挽狂澜于既倒，一直固守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惠命”，为儒学的重构和接脉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讨，他们中既有儒家形而上学的建立者也有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的构想者，代表了捍卫儒

1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47-248页。

学、对儒学进行现代重构和转换的主流，开拓了儒学研究的新方向。“新亚书院”的创建；《民主评论》、《人生》等杂志的创办；“东方人文学会”的成立；张君勱的环球讲学；尤其1958年由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勱四人联名发表标志着新儒家正式成立和诞生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的发表，凸显了港台及诸多海外学者对儒学的执着护卫和不懈探索精神。

第五阶段：70年代后期至今。

这一阶段，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学术界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学习风气，客观评价和对待儒学的氛围开始培养起来，与此同时，东亚模式的出现、全球化中多元化世界文化格局的形成、现代化的影响、“文明对话”和“全球伦理”的倡导等等，都使得儒学在改革开放后获得了新的契机。人们对孔子和儒学的评价和反思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传统文化热”、“寻根热”的热潮不断涌动。孔子研究、儒学研究在中国大陆逐渐成为了“显学”，思想界、学术界对之的研究可谓蔚然成风，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见的研究学者和学术群体，诸如《中国儒学史》、《中国的王权主义》等许多具有相当深度和学术意义的论文、专著大批量产生。有关孔子、儒学、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会议频繁举行，“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华孔子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中国文化书院”、“孔子研究院”等学术团体和研究机构纷纷建立。

仅关于孔子和儒学研究的会议而言，自1978年始就几乎每年都有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具体的有：1978年10月21日至30日由山东大学举办第一次孔子讨论会。1980年10月28日至11月3日由曲阜师范学院举办第二次孔子研讨会。第三次孔子讨论会由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研究会和曲阜师范学院孔子研究所联合发起，于1983年4月21日至25日在曲阜师院召开。第四次孔子讨论会于1984年9月26日至29日在曲阜师范学院召开，并成立了“中国孔子基金会”、“中国孔子研究筹备会”。第五次孔子研究会由中华孔子研究所主持，于1985年6月10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第六次孔子讨论会由孔子基金会和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联合举办，于1987年8月31日至9月4日在曲阜召开，又名“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际性儒学讨论会。随后，各种关于儒学的学术会议不断，仅1989年就召开了三次，它们是：①为纪念孔子诞辰2540周年，中华孔子学会10月在北京举办了“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为“儒家学说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②中国孔子基金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0月在北京、曲阜两地联合举办“孔子诞辰2540周年纪念与国际儒学学术讨论会”，主题为“孔子、儒家的历史地位和对现代社会的影响”；③曲阜师范